

《浩劫》

作者：丁抒

要目：

- 第一章 破四旧：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
- 第二章 中华文明链断何处？毛的罪行罄竹难书！... 19
- 第三章 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 23
- 第四章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40
- 第五章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48
- 第六章 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60
- 第七章 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65
- 第八章 文革死亡人数统计为两百万人... 77
- 尾 声 千万冤魂——中国大陆五十年非正常死亡调查... 82

第一章 破四旧：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祇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1）

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

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3)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〇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4)

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6)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7)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8)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9)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〇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10)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11)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糊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13)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馀年在全国搜购，曾微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

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祇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17)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18)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馀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0)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馀张。(21)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2)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3)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4)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着着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着着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26)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梁，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干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28)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祇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29)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30)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31)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32)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33)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34)

龙、凤皆属“四旧”

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传人，自从共产党上台，“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35)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当年十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36)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乾二净。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分被毁。”(37)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全国的狮子都遭殃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〇、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牒，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牒，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38）

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39）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40）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如今，那对狮子成了周恩来所说的“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41）

“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42）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毛泽东。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44）

长春不少人养殖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殖能手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后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后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着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各地孔庙无不遭殃

还在文革之前，“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公元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

在一九**年被当局平毁无遗。(45)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46)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大小宝塔被炸毁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48)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49)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50)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51)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祇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52)

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

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来不废修缮，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书屋主人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除做过一阵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后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清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54)后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安徽滁县琅琊山脚有个醉翁亭。“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毛泽东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

私章，白忙了一场。(55)

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鞞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后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后依旧着片重刻此碑）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56) 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57)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58)

任何一个大城小镇都有贩夫走卒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头惨，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玉堂春》流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59)国务院曾将关押苏三的监狱定为应当保护的文物。但根据“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洪洞县政府大门向南开，属“封”，必须向西开。西墙外正是当年关押苏三的那座明代监狱。“一个婊子有什么可纪念的？拆！”保护文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两全，洪洞县政府的书记大人只好保护自己，拆掉苏三监狱，将县政府大门改向了西。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60)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61)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62)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63)

“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

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65)
【汉译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〇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着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66)

民间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67)

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68)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后，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69)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

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泽东、毛批示同意后，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后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后再也无处寻觅。(70)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后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学老教授梁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72)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〇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后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祇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后，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埋没了。(73)

自己关门焚毁资料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74)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后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毛泽东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

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76)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缙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x x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馀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余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 (79)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到北京，重回中共怀抱。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〇年起先后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后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后，吓懵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80）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岷（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后，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摆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后点着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后，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82）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83）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

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后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心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后，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是仗着老子是高干的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指示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85)当时他们只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后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消灭伊斯兰教！”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权以后，到处拆庙庵、赶僧尼。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国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86)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后均被征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87)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联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已残存无几。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88)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宁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红军征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有“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四旧”。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90)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91)灭回运动这才告一段落。

周恩来鼓励灭喇嘛教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后，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92)，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 (93)

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后，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学院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因为据说有人曾用班禅的粪便做成药丸，给人治病。

出于国际关系的需要，周恩来煞住了那场灭回运动。可是西藏事务属中国“内政”，中共自可以关起门来革命。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当时）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 (94)“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 (95)

虽然他说“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96)实际上西藏众多庙宇都是在打烂毁坏后才作为学校、仓库利用的。只不过红卫兵为图省事，对大部份佛像仅斩首了事，胸部以下部份皆留下未砸。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17～650】死后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好守护。但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国佛寺大清扫

一百年前信了“天主”的洪秀全，见到孔子牌位就砸。四十年前的民国将军冯玉祥归皈基督后，把开封的千年古迹相国寺和城内城外的庙庵、道观全都拆除，连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大禹的铜像也毁了去造铜元。如今信仰了马列洋教的青年，对佛教的仇视与教徒之排斥异端毫无二致。

相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马驮梵文佛经。现存白马寺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97)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98)

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 (99)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日本佛教史迹参观团欲前往访问，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方为中国挽回了一点颜面。(100)

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一九六六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国现有的最大的古钟之一。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只好作罢。事后，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八年后“批孔”，一个六六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新津县在成都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将川西名胜‘纯阳观’的所有塑像捣毁。全县……绝大多数庙宇的塑像、壁画被捣毁。”(101)什邡县始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一九五一年中共为修铁路征集枕木时，已将道旁古柏悉数砍去。如今“破四旧”，目标只在寺内。“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102)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军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会合处构筑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十万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军，坚守了三十余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中矢死于钓鱼城下。钓鱼城遂成一历史名城。七百年来，积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红八月”中全部被毁。(103)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104)

九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105)老尼姑白银珍（蒙族）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后，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的众多庙宇被本县学生捣毁神像两千余尊。九月初，由屯溪县开来数百红卫兵，将剩下的神像捣毁殆尽。(106)佛教圣地皖南九华山，僧、尼全被勒令还俗，成为当地公社佛教大队的社员。香火既绝，谋生不易，政府补助还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费。一些僧、尼则配对成了家。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学家李耳）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这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两千年来，道家一直尊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

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后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八十年代按原设计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一九八八年海外华人佛教徒捐巨款修复该寺】(107)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极乐寺塔本是哈尔滨一景，被“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该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108)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109)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文物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一大国宝。当中学红卫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不过，周恩来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后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后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后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110)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111)

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时，普通中国人不敢公开反对，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个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三十年后，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后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12)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了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113)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迦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后，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后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后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后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114)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份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着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孤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115)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〇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116)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117)

一九九〇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着罗国宝，祇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了！

注 释

- (1) 慕湘《阿英的晚年》，见《钟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 (2)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一四九、一五一页。
- (3)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第294页。
- (4) 《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一页。
- (5) 《当代中国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一六八页。
- (6)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册第9-79页。
- (7) 一九八六年版《川沙县志》第38页。
- (8) 一九八九年版《嵯县志》第29页。
- (9) 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志》第20页。
- (10) 一九八九年版《江宁县志》第38页。
- (11) 一九八四年版《青村志》第十一页。
- (1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 (13)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汇》月刊。
- (14) 《人物》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一三三页。

- (15) 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〇九页。
- (16)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41页。
- (17) 《瞭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42页。
- (18) 《瞭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39页。
- (19) 《海上文坛》一九九二年二月号第91页,《世纪丹青朱妃瞻》。
- (20) 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454页。
- (21) 一九八二年版蒲山县《鹤山镇志》第93页。
- (22)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 (23) 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265页。
- (24) 《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页。
- (25)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号第44页。
- (26) 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该文影印件。
- (27) 一九九四年版《宣汉县志》第968页。
- (28) 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265页。
- (29) 一九九〇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154页。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第四十二页。
- (30)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陈毅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形势报告,同(6),第二册第10-15页。
- (31)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86页。
- (3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 (33)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七十一页。
- (34)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第十九页。
- (35) 一九九〇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
- (36) 《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号,艾湘涛《通天人物》。
- (37)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一二九页。

- (38)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份革命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 10-44 页。
- (39)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一二九页。
- (40) 一九九三年版《安远县志》第 587 页。
- (41) 《当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十七页。
- (42)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第二二九页。
- (43) 《瞭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 4 5 页。
- (44) 《瞭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 2 7 期。
- (45) 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 (46) 一九九二年版《霍邱县志》第六七六页。
- (47) 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 597 页。
- (48) 《含山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 第 20 页。
- (49) 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区志》第八七七页。
- (50) 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 597 页。
- (51) 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三页。
- (52)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5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54) 《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 (55) 《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 (56) 一九九二年版《宝山县志》第 920 页。
- (57) 一九九一年版《延津县志》第五七七页。
- (58) 一九九二年版《肥城县志》第 3 0 页。
- (5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代表时的讲话，同(6)，第四册第 1 2 - 8 5 页。
- (60) 一九八五年版《通城县志》。

- (61)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一一八页；
- (62)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 41 页。
- (63) 《文史资料选辑》第 9 2 辑第 3 8 页。
- (64) 新华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电。
- (65)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五页。
- (66) 同上，第六页。
- (67) 同(65)，万里云发言第 3 页。
- (68) 一九八六年版《修武县志》第 7 3 0 - 7 3 1 页。
- (69) 《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 (70) 香港《百姓》杂志第六十六期陆铿的文章。
- (71) 《三月风》（北京：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二十三页。
- (72)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 (73)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华艺出版社，1989）第 52、230 页。
- (74)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六十二页。
- (75) 《人物》杂志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 (7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二〇五页。
- (77)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 57 页。
- (78)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 15 页。
- (79)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 33 页。
- (80) 叶永烈《名人沉浮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 39 页。
- (81)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二〇七页。
- (82) 1966 年 11 月 15 日康生在乌鲁木齐市对新疆革命少数派的讲话，同(6)，第三册第 1 1 - 1 0 8 页。
- (83) 《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 (84) 《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7）第八页。

- (85)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接见首都十三个艺术院校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9-91页。
- (86) 一九八六年版《建德县志》第五〇二页。
- (87) 一九八一年版《台安县志》第三八九页。
- (88) 同上，第一三三页。
- (89) 一九九〇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154页。
- (90)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同(6)，第二册第9-56页。
- (9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同上，第9-61页。
- (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60页。
- (93) 一九九五年版《贵德县志》第27页。
- (94)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5页。
- (95) 1966年10月15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殉班的西藏学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82页。
- (96) 同上。
- (97) 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二十二页。
- (98) 一九八八年版《代县志》第三七八页。
- (99) 一九八六年版《运城地区简志》第五一二页。
- (100)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四八六页。
- (101) 一九八九年版《新津县志》第735页。
- (102) 一九八八年版《什邡县志》第21-31页。
- (103) 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 (104) 一九九〇年版《历城县志》第三九四页。
- (105) 一九八八年版《五台县志》第711页。
- (106) 一九九〇年版《休宁县志》第31页。
- (107)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 (108) 《黑龙江四十年》第 375-376 页。
- (109) 一九九〇年版《崂山县志》第 7 3 5 页。
- (110)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报》。
- (111) 《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六十七页。
- (112) 一九八九年版《铜鼓县志》第五七八页。
- (113)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 (114)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115)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 140 页。
- (116)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六十七页。
- (117) 叶浅予《十年荒唐梦》。
- (118) 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盗窃宝记》。

第二章 中华文明链断何处？ 毛的罪行罄竹难书！

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为何香港人,台湾人在思想,文化,礼仪等方面为何会比我们更像传统的中国人？

原因在哪里？这里只是讲述一些很多人不知道，也有一些人极力掩盖的历史，一段令炎黄子孙悲伤，困惑，愧疚的历史：

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祇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

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

在毛的鼓动下，学生开始“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3）

某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〇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活在历史上的，皆被称为反动派！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

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4)

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6)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7)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8)。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9)。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〇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10)。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11)。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糊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什么文物？没有文物！只有四旧!!!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

毛主席号召我们——砸!!!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这样的，对民族所犯的罪行，在毛的导演下演出了整整十年，而它的范围是全中国！……

后语：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底气的；一个毁灭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是万分悲哀的。为什么说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上面的滔天罪行，加上反右害死的数百万中国各行各业的脊梁使得中国发展严重受挫，并且影响至今；还有为了皇位死守谎言饿死了数千万老百姓。

这三条就是我们骂毛的最根本原因！

第三章 从批判“走资派”到揪“叛徒”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早晨，人们读到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人们还以为还是老一套，要横扫的是“地、富、反、坏、右”。等到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抨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全文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重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心时事的大学生们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大学的党委书记们也在那个“一切”之中。北京大学党委瘫痪自不必说，全市乃至全国的大学都立即沸腾起来。运动来势凶猛，各省、市委为了应付中央，也为了保护自己，纷纷丢车保帅，抛出一些干部，说他们是“走资派”，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当其冲，各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便成了运动的头一批斗争对象。

八、九月间，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该校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的问题时，发现三十年代中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牢，于是他们着手追查高的历史。因听说高在牢里生病时，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曾喂过他饭。而杨是一九**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便去北京，找到了杨献珍。经过“七审杨献珍”，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曾填写“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情况，

并说出一同出狱的人名：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下同）、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等，全是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这对打倒刘少奇无疑提供了一个重量级的炸弹。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理睬那一套。坏蛋抓得越多越光荣，他们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无疑。十一月初，他们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到处宣传他们揪出了一个大叛徒集团。在给周恩来的信里，他们写道：“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即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1）

红卫兵绝未料到，他们出动几千人次、奔波一百多万公里而终于调查清楚的“叛徒集团”，对周恩来根本不是新闻。收到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报告，他并没有予以重视。当时，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红卫兵“炮打”的对象，他没有时间一一向他们解释。

要是前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死，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因为这个案子是他一手操办的。一九三六年春，他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向新上任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可能占领北京，而北京的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骨干，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若日本人占领平、津，他们可能会被杀害。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宣布，在押的共产党祇要写一份自首书，表示放弃共产主义，出狱後不再从事中共的活动，便可释放。柯建议，让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办个手续出狱。为了营救这批同志，刘少奇同意向中央请示，并通过秘密管道通知狱中党支部。柯庆施通知北平市委负责人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由也在北平陆军监狱被关押过、并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因病被保释的孔祥祜（第一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写信，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

信件经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等递给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情共产党的看守班长牛宝正，转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的支部书记薄一波。起先，薄等怀疑那是国民党设的圈套，没有执行。（2）他们又担心写“自首书”出去後，会被指为叛徒，遂提出三项要求：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党负责。自首出狱後不受歧视。自首出狱後要按正式党员分配工作。刘少奇接到狱中同志的要求，立即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共没有主席，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後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收到刘少奇的信後，召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开会研究，决定让那批干部出狱。据张闻天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所说，刘少奇“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做的。我……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3）

确认已获中共中央批准後，除个别人认为那是向敌人投降、拒不执行之外，六十一个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集体办理了自首出狱手续，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至九月二日的《华北日报》刊登的由杨献珍起草的“反共启事”是他们与国民党监狱当局几度谈判、妥协修改的结果，取消了原来“启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字句。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後绝不参加共产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希望有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末尾署名者为徐子文等。徐子文是安子文的假名。在“反共启事”中，他们全都用了假名。

签署自首书、刊登启事是换取释放的一种交易，反正获得自由後国民党再也抓不着他们了。那六十一人出狱後，还是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工作，其中十人在抗日战争和随後的国共内战中牺牲。真正脱党投敌者仅有两名，

一被中共处决，一被管制。（4）

当时，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干部大多赞同刘少奇的“假自首”政策。如黎玉一九三六年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後便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需要大批干部，要营救监狱中干部出狱。”“狱中人可以发表宣言，拥护韩主席（引者注：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韩主席领导下抗日，拥护国民党政府，拥护蒋介石。”“报上发表反共宣言是陈词滥调，登不登报没啥关系。”（5）于是，几十名重要的共产党干部走出了山东“自省院”。

全国各地都有共产党员用“自首”、刊登“悔过启事”的方法走出监狱或反省院。以从山西太原和江苏苏州获释的为例，除死去的如王若飞（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失事遇难）等，大多在建国後成为高级干部，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薛向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王卓如、国务院二办主任徐迈进、国务院六办主任李浩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山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郑林、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建工部部长刘裕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化工部副部长梁膺庸、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等。

薄一波等出狱後，柯庆施曾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柯是政治局中除林彪外最受毛泽东倚重的成员，若不是他突然于一九六五年春病死，一定会成为毛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助手。而他虽会死心塌地地帮毛搬倒刘少奇，却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刘少奇叛徒集团”也就不成立。可能毛泽东也就不会想到最後用“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来扣死刘少奇，文化革命的历史也就要重写了。

差不多在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叛徒”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学红卫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问题时也发现，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的“刘华甫”就是刘澜涛。整个省城马上炸了锅。红卫兵来势汹汹，刘澜涛无所适从，以西北局的名义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周恩来紧急请示。对天津红卫兵的报告未予重视的周恩来，接到西北局的报告後，才觉得不表态不行了。他於二十四日拟写了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6）

中共高层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说之荒谬知之甚详。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会议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毛泽东是持赞成意见的。在文革中被关押时，薄一波就出狱经过写过一篇自述：“两位红卫兵要我写出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情况和我一九三六年出狱的经过。我考虑过了，认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写清楚，公诸大众。”他知道红卫兵後面是中央专案组，他写的材料将会送交中央，因此详细写了约一万五千字。他承认“登《启事》是事实”，接着将被捕经过和在监狱里与敌人斗争、最後办手续出狱的情况一一写清。最後写道：“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到延安学习，……毛主席找我谈话时，我将这一段监狱生活和出狱经过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当我汇报我们是执行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启事》之後出狱的，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後来，主席让我把这次出狱的人开个名单，我写好後送给了主席。主席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查出此批文，证实了薄一波所言。（7）一九四三年薄一波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汇报时，任也对薄说此事“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後让你们出来的。”（8）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听取周仲英汇报後，再次说：“这件事我知道。”（9）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还将那批出狱干部的名单列出，交给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备案。（10）可见这事在党内早有结论。

在拟就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信後，周恩来赶紧将他的批复件送毛泽东审批。他相信毛会同意他的意见，便同时给毛写了封信，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11）一收到周恩来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文件，毛马上签字批复“照办”。（12）其实，两个月前的九月十六日，康生曾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时在报上登的“反共启事”的影印件给毛看，并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

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那时，毛对康生的说法不以为然，没理睬他。（13）可见，当时毛泽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的打算。

周恩来刚发出给西安的回电，又收到了吉林省委的急电。因长春的大学生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处得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里的“罗林详”就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的化名，於二十五日贴出“赵林是大叛徒”的标语。二十六日，周恩来让中央办公厅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三十日，周恩来再次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让他们转交致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即吉林师范大学，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改名）“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王秋红的复电，重申二十六日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发传单、涂写标语。”（14）他还打电话到沈阳，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并要宋依照他的话回答红卫兵：“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15）

此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虽然已被打倒，但他是当年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手续的人。他见三十年前作了决定的事情又翻了出来，便於十二月七日将当年中共中央如何作决定的经过写下，分送周恩来、康生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其实，康生对薄一波等出狱的情况也很清楚。当年与薄一波同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刘格平（一九六六年时为山西省省长），因坚持不肯填写“自首书”，直到一九四四年才被释放。连康生都认为他太固执，曾对于光远、曾彦修二人说：“刘格平这个人太古板，中央有指示他也不出监狱，多坐了八年牢。”一九四四年康生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列宁认为党的策略要机动灵活”时，曾以此事为例，说明“我党中央（94）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16）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康生作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亦未就薄一波等刊登启事出狱一事质疑他们的代表资格，更没阻挠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历史上纠缠此事以达其政治目的者仅高岗一人。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酝酿中央委员名单时，他曾以“自首变节”为由，反对薄一波等进中委，因得不到毛泽东支持而作罢。一九五四年高岗欲取刘少奇而代之，其炮弹之一就是刘当年支持薄一波等刊登《反共启事》出狱，而且刘本人也曾被捕过，也有叛变嫌疑。但那时毛权衡党内力量後舍高取刘，高被冠以“反党集团”首领而囚禁，两次自杀、身败名裂。（17）

如今康生所以要在薄一波等“自首变节”一事作文章，不过是想帮毛的忙，找一条打倒他们的捷径而已。当时，他看毛泽东不予回应，便没在此事上继续纠缠。

按说，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就应当过去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发现，文化革命的阻力相当大，他能用来清除刘少奇系的干部的罪名并不多。而那批干部不除，他们就还会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开会来都还有一票。这是他不欲见的。他原先觉得，六六年十月间他亲自宣布了薄一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要将薄一波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定罪并不容易。而红卫兵抓“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提醒了他：刘少奇的最大资本是“白区工作”。刘少奇系的干部基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被捕过的比例相当高。给他们一顶“叛徒”的帽子，问题就全解决了。方便，乾淨。于是他决定利用红卫兵“揪叛徒”的举动，将薄一波们置于死地。

这么做，毛多少有点心虚。二月三日，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替自己解释道：“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後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18）

毛的这个“现在一查出来”，自然是哄哄友党同志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查，事情明摆着，不需要去查。“现在已经查明”是毛泽东发明的一大武器。早在一九五五年宣布胡风是反革命的时候，毛用的就是一句“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19）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为了打倒彭德怀，又把这武器拿出来了：“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20）六六年五月，为了给文化革命点火，把邓拓拿出来开祭，也是这样宣布的：“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21）

毛泽东不必担心有人会追究他说的“查”是什么，他不为这些操心。只要确保把那批干部打下去，使他们不能东山再起就成了。搞文字游戏，康生是能手。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送到毛泽东了那里。对于文件中说的，“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显然非常满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着毛主席干的”是句谎言，大笔一挥，批准印发全国。（22）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还活着的成员中，有二十二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职务，十三人为司局级干部（包括南开大学红卫兵要揪的该校党委书记高仰云）（23）。这些刘少奇麾下的所谓“白区干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一九五〇年中共进军西藏时的先遣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东北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等被残酷整死。

周恩来颇识时务。看到毛泽东态度明朗，蓄意要借“叛徒”问题打击刘少奇的势力，便不再为那六十一人说话。他装聋作哑，好象他在去年十一月给毛写的信，以及毛的批复都压根不存在似的。而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则竭力为“揪叛徒”运动造势，鼓动红卫兵四处出击：“三五年到三六年叛变自首的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24）

本来，党的高层都知道柯庆施在“六十一人”事件中起的作用。但柯庆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为免红卫兵将他拖进去，乱了自家阵脚，中央文革特地给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发去电报：“柯庆施同志是个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对柯庆施同志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25）为了将“自首叛变”的罪责完全安在刘少奇头上，专案组审讯“叛徒”们时不许他们在交代材料中写上毛泽东知道他们出狱的事。专案组明确告诉薄一波：“你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如果不讲，）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从宽）。”（括号内为引者所加）（26）薄一波坚持如实写下曾向毛汇报过，并给毛写信申诉。可是没用，毛泽东不认帐了。此时刘少奇被软禁，周恩来不吭声，只要毛泽东活着，这“叛徒集团”的案子就翻不了。

张闻天自一九五九年就被毛泽东打倒起就已是戴罪之身，文革一开始就被斗得呜呼哀哉。南开大学红卫兵找上门后，更被“六十一人”事件纠缠得脱不了身。当初中央讨论后张闻天签字回覆刘少奇，“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27）但现在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他是“反党分子”；毛不认帐，他就不敢实话实说。在给康生连去两封信希望中央对此事作一澄清却得不到回音的情况下，他只好以给审讯他的“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同志们”写信的方式，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

这封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的信，是一堆真话和假话的混合。一方面他不肯写材料说那六十一人是叛徒，坚持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另一方面为迎合毛泽东清洗刘少奇的意图，他又写道：“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招降纳叛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28）

据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当时张闻天如果说六十一人出狱的事毛泽东知道，就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罪名他“担待不起”。（29）为了避免被指为“攻击毛主席”，张闻天谦恭地说：“（我）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他还特地含糊不清地说：“刘少奇的信，我以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通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30）

虽替毛作了掩盖，张闻天还是不能脱身。因为他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康生派人恐吓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张拒不改口，并对妻子刘英说：“我可能被逮捕。”果然，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起，他就被“监护”，见不了妻子的面了。（31）

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对康生来说，也是个大胜利。毛对他的倚重与日俱增。他食髓知味，又把眼睛瞄准另一批人，弄出了个“新疆叛徒集团”。原来，一九四五年底，蒋介石委派亲中共的张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来要求张设法释放一百余名已被关押了几年的共产党员。张到新疆後，在忙于成立新疆民族联合政府之际，几次给蒋介石打电报请求释放那批在押的共产党员，终获蒋介石首肯。一九四六年六月，那批干部“声明脱党出狱”（32）。张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又派了一位将军一路护送到延安。那批人回到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曾亲赴欢迎晚会。现在康生却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动下，红卫兵四处冲击那些干部所在的机关，要将他们揪出去斗争。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也清楚得很。那批干部级别稍低，同刘、邓瓜葛不深，毛泽东没有清洗他们的计划。周恩来明白替他们说话不致与毛冲突，所以亲自出面向揪叛徒的红卫兵代表说明：“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33）

可是事情没完。那批人中有一个时任江西省省长的方志纯，一九五九年夏，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开会时，趁江青远在杭州，托方志纯夫妇秘密安排，将其二十年未见的前妻贺子珍（虽并未履行离婚手续）接到庐山，见了一面。因消息走漏，江青马上向毛要求去庐山。毛不得不让贺子珍在他们见面的第二天、江青到达之前下了山。从此二人生前未再见面。

江青探知方志纯牵线的事後，没有马上发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团”的首脑，唆使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关进了监狱。这时，毛泽东知道江青为什么恨方志纯，但此刻江青是他最可靠的亲密战友。他无需为了一个方志纯而破坏他与江青的合作。于是“打倒大叛徒方志纯！”的标语立刻在全国散布开去。

象上回“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案子一样，周恩来再次退缩。既然毛泽东默认了江青的做法，他不再坚持“这批同志没有问题”，这“新疆叛徒集团”案就这么钉死了。方志纯在铁窗下蹲了八年。他幸运，活了下来。可是九十名同被投入监狱的“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被折磨死了二十四个，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34）

揪“叛徒”是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只要被捕过，就可以指为叛徒而打倒。仅根据“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类的罪名，没法把那些干部打得“永世不得翻身”。唯有“叛变革命”一条是铁板钉钉。一九六六年八月取代被打倒靠边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陶铸，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国共合作，国民党集体释放共产党要犯时，中共向国民党交涉、点名要人後，从南京陆军监狱被释放的。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决定搞倒陶铸，江青一月四日接见湖北红卫兵代表时宣布“他是叛徒，我们有证据”（35），陶便直到被整死也没翻身。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是因国民党执行协议放人而从苏州反省院获得自由的。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他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隨後上海召开斗争曹的电视大会，就对全市人民公布：曹荻秋是“叛徒”。经过数年调查，曹荻秋专案组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交出报告说：曹在国民党监狱里“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证据。”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下令：“就是应该写曹荻秋在被捕期间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出卖了组织，出买了同志。”专案组便修改报告，说他出卖党组织，是个“大叛徒”。（36）因“被捕叛变”而被彻底打倒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天津市委书记张淮三等。

文革初期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也是因为“叛变”。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天刘志坚被日军俘虏，但当天中共冀南部队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军将通过某地，于是打了个伏击，将刘救了出来。显而易见，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给了他一个“叛徒”身份，关了起来。

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是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成叛徒，冀东党

组织也成了“国民党”。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37）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一九四二年时任中共鲁中区党委书记。当时日本占领军“强化治安”，屠杀和诱降并用，允共产党员“自首”，不咎既往。霍士廉主持拟定《鲁中区党委关于反自首的决定》：“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掩护一部分同志，根据情况可以组织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去自首。”“在反共宣言、反共启事上签了个名字……不算自首。”文革中，西安交通大学的红卫兵据此说霍士廉是叛徒，坚决要打倒他。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通知陕西军区，把霍士廉“交给革命群众批判斗争”。六日，西安召开十多万人大会斗争霍士廉，最主要的口号就是“打倒大叛徒霍士廉！”（38）

“抓叛徒”成了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全国统计，仅在一九六七年的头五个月里，因历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为“自首变节”或有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共达五千二百余名，其中几百人被残害致死。（39）譬如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描写的是三十年代海南中共游击队女子军第一连的故事，一九三二年该连被国民党军打散，大部被俘，包括第二任连长冯增敏。（第一任连长庞琼花於一九三一年女子军成立後不久被送到根据地“审查”时死去。）後冯被释放，找到共产党继续革命。但既然被捕过那就是“叛徒”，她很快就被整死了。

始于一九六七年初的“揪叛徒”运动，不仅斩断了刘少奇的左右手，基本摧毁了刘少奇班底，而且“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更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40）此外，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由此理出一条线索：要把刘少奇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叛徒”是比“走资派”更好的帽子。若刘少奇是个叛徒，给他定案的难题就一下子可以解决。贩夫走卒可以弄不清什么是“走资派”，几亿农民可以拥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叛徒”、“内奸”却是人人喊打的。在发现可以用此罪扣死刘少奇之前的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毛泽东还打算象对待滞苏不归的王明一样处理刘少奇，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说“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41）到三月间就不再那么说了。

三月是个关键：九日，陈伯达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是欺人之谈”；“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42）十日，毛泽东回复写信给他、说“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的章士钊：“尊计似应缓行”，并派人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章看罢叹道：“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43）十六日，毛泽东批准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去《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称赞刘少奇的一段话；（44）同一天，他批发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二十一日，中央常委讨论“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叛党嫌疑问题”（45），毛泽东批准康生写的刘少奇曾被捕叛变、应立案审查的报告，并指定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46）差不多同时，毛审阅并批准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47）

三十日，戚本禹的文章刊登在《红旗》杂志上；三十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这篇文章。这是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号角。戚本禹对人人皆知的那个“你”，写道：“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用爪牙之口宣布给刘少奇定死罪。

戚本禹的文章中对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持反共’？”（48）中南海的“卫东”战斗队於四月六日给刘少奇发了个“紧急通令”，要他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的问题。刘於四月十四日交出“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对那八项指控一一回答。他写道：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於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49）

刘的答复被抄成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但几个小时後即被撕碎。这是刘少奇对“招降纳叛”的指控所作的唯一正式的回答。但正如章士钊所言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无论他如何解释都没有用了。以後在中南海的小规模斗争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毛主席语录》本敲他的嘴和脸，喝令“不准放毒！”刘少奇的嘴也就从此闭上，再也没有作任何辩解。

至于刘少奇本人的“叛党嫌疑问题”，毛泽东已指定康生负责去办，实际领衔的是康生和江青二人。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刘少奇专案组”就已变相成立。鉴于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身份特殊，当时的名称是“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五月後改叫“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时叫“刘少奇专案组”，有时叫“王光美专案组”。组长是谢富治，开始副组长是江青，经江青提议改成汪东兴後，江青实行垂廉听政。（50）谢富治指示专案组：“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专案组向江青、康生提议听取刘少奇本人的申诉，被否决。江青对该专案组负责人萧孟不满意，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将他逮捕下狱。江青自己也曾扬扬得意地对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人自夸：“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51）

其实江青自己也被捕过。她一九三四年九月被捕，经人交保释放前也写过自首书。（52）自然，她当时不到二十岁，算不得是叛徒。早先，她自己也不把这事看得很重，一九三七年从上海赴延安途中，曾经在西安将自首出狱的经过告诉过在上海认识的女共产党员徐明清。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一样。一九三八年春，他在天津被捕。九月转押北平，和那“六十一人”成了难友。陈被判处两年徒刑，但关了不到一年就通过大革命时期陈任其秘书的国民党将领张贞出面，填写“改过书”後保释出狱。如今他们在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不过是看准这是一条扳倒刘少奇的捷径罢了。

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让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出面指证最方便。康生指使专案组对在押的安子文说：“你立功的机会到了，你只要写个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明，就可以马上把你放出来，可以跟家人团聚，还可以恢复工作，将来开‘九大’时还可以当中央委员。”（53）安拒绝後，他们重点着手的，一是一九二九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与他一同被捕、一同被释的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一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与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後脱离共产党的丁觉群。在十几个人轮番逼供几天几夜不得休息的情况下，他们一度坚持不住，分别写了伪证。但事後马上就翻供。专案组一则批斗、一则威胁：“要考虑你的性命和全家的的问题”，对翻供一概置之不理。丁於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後，曾对他的儿子说：“我深深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54）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必须被打倒，而所有“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中，最过硬、最能使全党乃至八亿人民都认同的，莫过于“叛徒”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中发〔68〕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55）“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的影响力，远大于批判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效力。以致国人皆知刘是“叛徒”、“内奸”、“工贼”，对其“走资”反而不甚了了。譬如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传达到赣东北农村後，许多村庄在村口竖起刘少奇泥塑像。挂在泥塑脖子上以标明其身份的黑牌写的不是“走资派刘少奇”，

而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56）就“批倒批臭”刘少奇而言，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

整死刘少奇，毛泽东心虚，为防备日后有人为刘少奇翻案，他在批复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57）的信、同意让他复出时，特别说明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58）可见，除了给刘少奇扣上“叛徒”、“投降敌人”等罪名外，毛泽东已拿不出什么法子向全国交待。

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向全国散发的报告是用无中生有的材料编织成的。该文件指控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被捕后投降，“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59）而历史事实是：“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60）

若没有那个凭空捏造的报告，单凭似是而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不足以给刘少奇定罪。若是那样，可以肯定，中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拒投赞成票的将远不止陈少敏一个人。即便如此，认为刘少奇被诬、被栽赃的人还是很多。在高压恐怖政策下仍敢为刘鸣不平、以致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的，全国多达两万八千多人。（61）不少人被枪决，包括宁夏中学教师朱守中、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

一九八〇年初中共中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时，除开华国锋、汪东兴等少数几个文革得益者，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人反对。由此可见，真正认同对刘少奇的栽赃，相信他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人，其实少之又少。

由此看来，若没有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揪叛徒”运动，刘少奇是否会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轻易被打倒，文革会怎么结束，似乎是个谜。

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1472—1528）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之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年被当局平毁无遗。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遵遵勿违。”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圭臬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〇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余，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

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锹，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32—前202）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181—234）“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书圣王羲之（303？—379）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617—650）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680），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999—1062）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晓得中共也曾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两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1592—1549）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1514—1587）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1525—1582），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1584—1630）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余姓部属冒死收殮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

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余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1592—1649）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10—1581）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清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1630—1715）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1838—1896），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1837—1909）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1858—1927）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〇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1861—1919）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站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砸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

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1853—1927）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1398—1457）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1874—1961）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

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中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1896—1925），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1899—1935）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但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殓尸造坟本是“四旧”。可十年后毛泽东死去，中共却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原注：篇幅所限，本文注释由编者删略）

第四章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一）军队奉命支持“左派”镇压“右派”

一九六七年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倒台已成定局，举国遍地都是“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大字标语。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参与上海夺权的造反团体的贺电。全国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继垮台，省委第一书记几乎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揪上斗争台。

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请示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1）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当天发出了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决定说明：“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并指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2）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3）

二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了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4）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

帅，叶又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但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他原本设想的是：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夺权。但新的领导班子由原领导人中与刘、邓、陶无瓜葛的干部及军队将领掌握，加几个左派组织的代表在新政权里作点缀。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走资派”，没有哪个组织还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每个组织都要打倒“走资派”，都高喊“打倒刘、邓、陶”；每个组织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有资格参与夺权。可谓咸与“革命”，区别仅在先后。

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难以操作。

军队既获得让他们“支持左派”的指令，中央又不告诉他们谁是“左派”，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去“支左”。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加上由于党领导一切，省委第一书记往往兼任大军区或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往往兼任军分区政委，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颇为惺惺相惜。对于地方干部被指为“走资派”而残酷批斗，军队干部难以接受。虽然中央说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就是“左派”，可是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要军队支持他们，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造反派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倒了军区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书记倒了军分区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军队的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应当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区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斗争军队内的反党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相继被打倒、斗争。十九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一批军队将领在北京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二十六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

这样一来，左派又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右派了。

这个矛盾无解。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军区的是右派，行不通。至于毛泽东说的右派冲军区要追究，左派冲军区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

更严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

大刀长矛时代，老百姓还可能用刀剑和军队搏杀，而今有机枪、坦克、飞机、大炮，根本不会有人以卵击石，对军队“动武”。对军队“动武”的可能性不存在。可是，“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却给了军队巨大的空间。当军队要为镇压制造理由时，只要说“对方动武，我们还击”就够了。而这是军队领导人的尚方宝剑，足以使下级军官、战士接受，把枪口对准群众组织成员，对准老百姓。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的、这么做的。

（二）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夺权

一月十二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上海造反团体的贺电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正如李葆华在安徽饿死二三百万人后于一九六二年初被刘、邓派到安徽取代曾希圣，王昭也是在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语），造成大饥荒，人口近百分之十非正常死亡后调去的。安徽有人称李葆华“李青天”，青海也有些老百姓称王昭是“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罗瑞卿保驾的。”既然文革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发轫，“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自然认为王昭是“彭、罗安插在青海的死党分子”，应予打倒。（5）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而赵永夫心里对“八·一八”恨之入骨，在党委会上却不情愿地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军区内部，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当时，毛泽东对是否许可军事首脑机关成立群众组织和夺权还没有明确的指示，有关政策相当含糊。（直到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说“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夺权和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赵永夫的支持者便利用此政策含糊的空间，效仿地方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三个小时后，起来造反，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派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他们宣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夺了刘贤权的权。刘贤权被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住处放双岗，警卫员、秘书不得与他接触。他们拥戴赵永夫，赵则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导人。

一月二十五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获总后勤部青（海、西）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当然不卖赵永夫的账。他们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一小撮混蛋！”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书记王昭。“夺权”受中共中央支持，无法抗拒，与其被“夺”，不如交权。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因此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夺权，毋宁说是省委、省人委和平转交政权给“八·一八”。

其实，全国各地夺了权的“左派”都没有掌权。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在替中央文革、替毛泽东“夺权”。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国家是共产党的，掌权的必须是共产党的官员，这是极其自然的事。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只是帮助毛泽东打垮刘、邓那条线的人物，现在毛泽东已用不着他们了。毛泽东安排了军队“支持左派”，实权落到了“支左”的军队手里。

青海也一样，由于杨植霖、刘贤权、张江霖皆较软弱，强悍的赵永夫控制了军队，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二月四日，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一份电报，说“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将电报发给中央，被赵永夫拒绝。刘的夫人安绍杰将电文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兰州，由兰州军区发给中央军委。但未获回应。

因此，“八·一八”名义上夺了权，其实只是得了几枚公章，并无任何实际权力。他们惟一夺到手的，只是一

个《青海日报》社。

（三）赵永夫军管《青海日报》不成

青海对决之势十分严峻：赵永夫及其在省军区内的追随者对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副司令张江霖；“红卫兵总部”、“捍卫队”、“贫下中农红卫军”对“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这时，由于对方攻击其组织“不纯”，“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纯洁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整风”，将几个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门严肃处理。结果给正在伺机行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一个出手打击“八·一八”的机会。

二月三日，张晓川掌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出动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军车，省军区的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全城游行。他们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坏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借以向“八·一八”示威。

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二月四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而赵永夫和张晓川也决心打垮摧毁整个“八·一八”组织。军权、政权都在他们手里，摧毁“八·一八”是其既定方针，问题只在何时动手。

中共明文规定，×省日报都是共产党×省委员会的机关报，此外并无省报。可是此时青海省委已交权瘫痪，《青海日报》在“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控制之下继续出报。赵永夫等视该报为眼中钉，起先想封闭报社，未获省军区领导层的支持。此时已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警备区对《天津日报》军管的先例。赵永夫等遂转念，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日，军管小组到报社。但占据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组织动员守卫报社。西宁市各“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员组织派去近千人守卫报社，相当拥挤。当时气温很低，有的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赵永夫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暂时没有动作。军队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烧煤用尽后，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着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有的家属给他们送饭送水。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八·一八”控制报社继续出报至十七日。

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但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给赵永夫发去“三条指示”，要求部队撤离报社。赵永夫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等十二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三条指示”。而兰州军区把要求青海军区将部队撤离报社的指示用电话传给了“首都三司联络站”和“八·一八”。“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

十九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二十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次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四）赵永夫决定武力强占《青海日报》社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的几天当中，青海省军区向中央发了十几份电报，但未获明确指示。据当时林彪

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6〕

中央对青海事态虽不表态，但实际上正在全国支持军队“镇压右派”。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的“坚决反对右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实施。

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7〕于是湖南驻军和公安局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大逮捕，全省约十万入狱。〔8〕譬如黔阳县，“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骨干部四百余人被拘捕关押。〔9〕

成都军区于二月十七日开始在四川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抓了数万人。〔10〕如安岳县公安局于二月十九日以“反革命罪”拘捕一百多名造反派，取缔了二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同日，宜宾县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红旗派成员。〔11〕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赵永夫和张晓川知道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二月二十一日，他们再次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刘贤权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见一致。他们拟定行动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召集动员会议，强调说：“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12〕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略）

与此同时，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改到二楼。

（五）文革中首次大屠杀

海日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报社内的人不可能抵抗。双方只是等待。

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门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13）

“二十二日晚，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给她守报社的爸爸送饭，由于天晚了，她爸爸不放心，没让她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弹后，她扑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这时一梭子弹打过来，她就被当场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谈起非常伤心。”（14）

后来周恩来处理青海二·二三事件，接见青海代表时，让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汇报当时的情况。许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15）

赵永夫还调去一个喷火器班。但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喷火器未用上。

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二时半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据被俘的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说：“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在（被俘者）人群中走来走去，从八·一八派的大队长到小组长以至一般成员，全被抓出来，高举双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说：‘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16）

（六）赵永夫编造“八·一八”开枪的谎言

枪声停止后。赵永夫、张晓川等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并层层传达编造的统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朝过道撤退，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军队共死亡四人，但那不是被“八·一八”成员打死，而是被参战的战士误伤的。由于部队从报社前面、旁边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开枪，而报社范围仅一百米见方，有战士被对面的火力击中。据《青海日报》记者周衍庆目击：“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背着另一个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另一个解放军同志用手按成喇叭形呼喊：‘别打，是自己人。’这样对方才停止射击。”（17）

周恩来处理青海事件时，有人汇报说：“一个小女孩身上中了三枪，解放军问谁打的。 she说是解放军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说是解放军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说：‘我看见是解放军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18）

青海军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八·一八”有枪、有机枪。后来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周恩来说：“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现场有没有？”（赵永夫回答含糊）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永夫：“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但没搜出来。”

周恩来：“现场上怎样？”

赵永夫：“有弹壳。”

……

周恩来：“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除非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

周恩来：“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二百六。”（实际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19））

周恩来：“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永夫：“没有。”

周恩来：“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吗？”

……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当场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20）

（七）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

事件发生于二月二十三日，而上述周恩来出面处理是三月二十四日，隔了整整一个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中央至迟第二天就知道了。三月二十四日林彪的夫人叶群说：“二十四号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21）可见事件一发生毛、林就知道了。但叶群所谓毛、林“非常生气”却是十足的谎言。毛、林根本不需“非常生气”，只要一个简单的批示，赵永夫马上就得负荆请罪，哪里还用得着等一个月！

事实是，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林彪都着眼于保护军队，不打算处理此事。当时毛泽东刚将冲击部队的组织定为右派，批准军队镇压，所以不想把火往军队引。林彪秘书张云生说：“主席最初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可以进行镇压。”（22）

中央文革欲将此事定性为军队血腥镇压红卫兵的事件，以便打开缺口整肃叶剑英、徐向前等军队领导人。无奈毛泽东不予理睬，中央文革奈何赵永夫不得。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周恩来当然不会有所动作。据张云生分析：“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似乎是尽可能稳住部队，并给那些把造反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右派’以有力的回击。因此，尽管中央文革印发的告状材料写得感人肺腑，并未受到最有权威方面的理睬。”（23）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秘书向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24）

有中央军委撑腰，赵的胆子也壮了。据刘贤权说：“二十四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25）

赵永夫继续“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〇四人。”（26）“一个牢房是两层铺，原来最多住二十四人，但塞进了七八十人，甚至有塞进一百多人的。有个牢房由于关人太多，上层铺坍塌，压碎一个人的脑袋，当即死亡。看管人员说：‘反革命死了也活该’。”（27）在贵德县，“武装部执行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命令，对全县‘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目及部份成员，逮捕入狱；副县长曹廷九被扭送监狱。”（28）

三月八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指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时，“军级干部会议”（后来又叫“军以上干部会议”）已开了两个星期。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他借机自我表功，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据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后来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29）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青海代表时，叶群也对赵永夫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30）

由此可见，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军队领导人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的。

（八）为平定“二月逆流”而处理“二·二三事件”

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改变主意了。当他发现对文化革命表示不满的元帅、副总理们是最大的威胁时，他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态度就变了。他要回击几位元帅、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反对文化革命的“二月逆流”，所以当中央文革张春桥等给他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此事件时，他于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1）

叶剑英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等人因为“二月逆流”问题而摇摇欲坠。为保自己，只好丢车保帅。叶剑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32）

对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评论，不置可否的林彪开始表态了。三月二十日，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听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后，指示把该录音大量录制，发给全国各地播放。（33）

直到这时，一直没明确表示意见的周恩来才着手出面青海“二·二三事件”。他接见青海代表，宣读中央关于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为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青海“八·一八”平反，甚至指挥战士当场撕掉赵永夫、张晓川的领章、帽徽，押走。

可是，如果叶剑英、徐向前等没卷入“二月逆流”，毛泽东很可能不会改变对青海事件的态度，赵永夫将继续当他的“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青海“二·二三血案”的冤魂也就将含恨九泉，永无翻身之日了。

注释：

1.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84页。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杭州：浙江省联总，1968）第111页。
3. 同上，第114页。
4.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87页。
5. 1967.4.20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1967）第45页。
6.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1页。
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99页。
8.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90页。
9. 《黔阳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32页。
1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3页。
11. 《安岳县志》第30页；《宜宾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1）第456、457页。
12. 一九六七年四月青海军区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宣传材料，《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9、53、54页。
13.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36页。
14. 同上，第38页。

15. 1967. 03. 24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13页。
16.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33页。
17. 同上,第36页。
18. 1967. 3. 24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纪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14页。
19.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35页。
20. 同上,《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7至10、15页。
21. 1967. 03. 24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15页。
22.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6页。
23.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2页。
24. 同上。
25. 1967. 4. 10 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21页。
26. 同上。
27.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38页。
28. 《贵德县志》(1995)第28页。
29. 1967. 4. 20 安绍杰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44页。
30. 《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9页。
31. 王年一着《大动乱的年代》第204页;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6页。
32.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03页。
33. 同上,第101至102页。
- 原载《文革大屠杀》(宋永毅主编,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

第五章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

清理阶级队伍"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文革中真正恐怖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而是六八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打倒刘邓後，收回"民意"牌

共产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

到了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产党垄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後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

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

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後，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後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

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於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

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姚文元再次写文章替毛泽东阐述思想。文章说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只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全国大清扫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已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x x类人"。被归於"x x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

"清阶"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清阶"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饉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七十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三四人。"

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所以敌人们或是"反动资本家"，或是"政治骗子"，或是"国民党嫌疑"。有的叫"历史反革命"，有的叫"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叫"反动会道徒"，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譬如大庆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

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支左"的军队干部把天津市塘沽碱面厂的八个工程师定为特务，施加种种酷刑，结果八位工程师全部打死。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带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因为许连荣长得比较漂亮，而且"家庭有问题"。其实许家的唯一"问题"是许的哥哥在中学念书时，曾被诬蔑参加"反动组织"判过三年管制。

在"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按指印，回家对女儿无法交待而自杀。而实际并无被逼按指印的事，这个戏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编出来的。而今的真实故事是，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上吊死。

事後，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

一九六八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如何办？

(一)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

(二)以"大干社会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

(三)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

後來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赴甘肃联合调查，写了一个报告，说："普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的县，在甘肃不会少于二十个！""估计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江西大屠杀

江西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人程世清。该省的口号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

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後，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¹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

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

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

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

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政治、经济大扫除”

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六八年九月，湖南攸县在全县“横扫政治垃圾”，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近二十年来，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

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二八七，八八五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

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〇十四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造成十人死亡。

各类“特务”遍布全国

由於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一棵槐树上，告别了曾经为他的胜利而沸腾、把他视为英雄的祖国人民，年仅三十岁。周恩来在闻知容的死讯后，过问了体育界的运动：“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不允许批斗关押！”庄则栋等人因此获得了解放。

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老修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关了五年。他的战友们“关的

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人，共用刑罚种样；致死七人，致残一百九十二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外蒙古和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地。

说你是“国民党”，并等于你非得真是国民党员，真参加过国民党。“国民党”不过个筐子，只要想打倒你，把你装进这筐子就是了。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一九六八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演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一九六八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

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一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 9835 个”。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一万二千余人。”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

六月，河南新安县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挂牌游街示众后，将一万多人送进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

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 11471 人被审查批斗。

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高邮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有一万三千多人被当作各类分子“审查”。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于是上行下效，各级革委会揪出一万四千六百多人批斗。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譬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阶级敌人”六千六百多人。……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仅十二万人口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 2,648 人。仅 3.25 万人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 名，八人自杀。

全国两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重划阶级成份

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你本来是右派，当时没把你打成右派，因为你漏网了。这一次把你补上。

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所谓“漏网”的分子们补上也是一大内容。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农村牧区搞重划阶级成份运动，“错划成份 480 户，错误批斗 683 人，受株连 2118 人。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

江西景德镇在“清阶”中，“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 156 人，富农 145 人，资本家 464 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份子 207 人。”此外，还有三百八十个“怀疑对象”，现在先说“怀疑”你，下次再来什么运动时他们就将是新的“漏网地主”……。

二十年前中共搞“土改”时，地主、富农的财产已被全部剥夺。他们现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员，也靠劳动吃饭，而且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还得比别人劳动得更多。可是他们一入另册，今生今世便永远是“四类分子”，其子女甚至孙子、孙女都是贱民。

六八年秋，江苏高邮县一个村子的"贫协主席"郭金贵找到本村的四类分子王世昌，对他说："你要不挨斗，就把女儿给周家，我就给你把帽子摘掉。不然，挨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王屈服了，他的女儿王家娟却不肯如此嫁人，周家送来订婚礼之后决以死抗婚。获救后，母亲哀求她："要成全父亲，否则你父亲的帽子永远摘不掉。你们做子女的也就要背一辈子黑锅。"就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地主的女儿被带到周家，做了二十年前的贫农的儿子的老婆。

"群众专政指挥部"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所谓"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国民党"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八月，根据省、地革委会的指示，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向阶级敌人展开决战誓师大会"，总共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〇七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五月一日浙江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 6425 人，"其中打成重伤的 181 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 59 人。"

"广西大屠杀"

广西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

八月十六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二十三种人"【各种"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犯过错误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h2)该县在"清阶"中被打死者至少在五百以上！

这只是个别的屠杀行为。一九六七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后，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继续与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斗争。韦国清为控制全自治区，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对"四·二二"实行屠杀。这场由广西军区组织，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因官方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所以先在全自治区张贴破获受台湾支持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布告，号召全区人民缉捕"反共救国团"成员，继而以毛泽东"群众专政"为根据，由"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杀完了对立面，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部份是农民部份是华侨，因华侨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员，死了一百多人，多为活活打死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派了一个连去县武装部，不得不缴了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为图省事，往往将"四·二二"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h3)，正是如此。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因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消灭"四·二二"、残杀"四·二二"俘虏的同时，"联指"内的愚昧民众将"四·二二"方面的人及其家属捕而食之。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他们顺便将每次运动都要挨一次斗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罗列出来，吃掉，彻底解决问题。

到七月底自治区革委会筹委会下令禁止乱杀时，全区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杀了。总共杀了多少？仅桂平矿务局被杀的就多达数百名。全区被杀者至少五万，很可能接近十万。

湖南"道县大屠杀"

湖南零陵专区，以道县为主的大屠杀。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城里失势的一派，到道县乡里动员支持共产党的贫、下中农消灭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被杀与被迫自杀者共七千七百人，其中近一半是"地富子女"。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三个最小的才五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也是小学教师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的孙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随即将他们一一推进石灰岩溶洞。

一九六七年九月，湖南嘉禾县坦坪、广发、莲荷等公社，部份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及其子弟被杀。"二十日，驻省支左部队紧急命令制止此风蔓延。"

造反派被"清理"

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产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即便怕造反派尾大不掉，也只需缴他们的械，不必置他们于死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阶"予以清算、镇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被捕、《十条命令》下达后获释的人，这时大多又成了"清阶"的对象。这一来，再也没有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来搭救他们了。湖南宁乡县，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

云南省"清阶"的主要内容是"划线"。在两派斗争时"站队"站错了线的都是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大学是"清阶"重点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

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

在安徽大学"支左"的军代表在该校"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八百〇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五分之一被"审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十二人自杀，包括两位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杀。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原有教职工八百〇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

一个大学批斗牛鬼蛇神时，一个老教师的脖子上挂着个黑牌，上写"历史反革命"，因为国民党时代他曾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斗争会上，一位十五岁的少年跳上台去，对他大喝一声"跪下"，接着对长者左右开弓一顿耳光。台下的群众则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少年就是那老教师的儿子。少年还在台上"向毛主席保证"，回到家里，也还要对其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本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九六三年因"反革命"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去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他的父亲、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安排他进了北农大。六八年春，他的旧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四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二十六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郭老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是女作家谢冰莹的女儿。谢冰莹抗战胜利后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生父符号一九五〇年应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职，五七年反右时与部长章伯钧一道成为右派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爬上学院建筑的最高层，纵身而下。于是学校给符号发了一则电报，电文仅一句话："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

农村中小学教师遭殃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阶"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

河北邢台县，四百多名教师在"清阶"中被"审查"，八人被逼自杀身亡。

山西省山阴县，六百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阶"，一位刚从北京分配去的大学生记述道："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栓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

广东和平县，一千一百余名中、小学教师，四百二十四名被抓起来"审查"。"全县被揪斗一万二千余人.....非正常死亡二百四十三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者七百五十余人。"

科研单位"开杀戒"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阶"。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夥一夥的，象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五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六八年十二月，省革委会指示撤销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员、研究人员们或送农村，或去工厂，毛泽东所说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灭了两处。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一九五〇年自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一九六八年十月，该所"工宣队"派出"专政队"，将他家的财物抄没一空后，把他关进了"牛棚"。在挨了数不清的斥骂和鞭打后，他服安眠药结束了痛苦。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见到丈夫的遗体后，决心赴黄泉与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大肆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

工人也成"清理"对象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

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 32109 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陕西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又叫“庆安公司”？）自十一月开始大揪“国民党特务”，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六十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乾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万人批斗大会还请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二百多名代表到场“观摩学习”。运动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十五人自杀未亡，七十四人被打伤打残。

在“大清查”运动中，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乾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一九六二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一见抓出个大鲨鱼，马上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成绩巨大，连不识字的、以买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的桂冠。最终结果虽证明那是子虚乌有的事，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一九六八年夏开始的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若干大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人被关押，一万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残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七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江青接见天津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劳改农场。

由于江青说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河北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于是天津市有三百〇七人被打

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主管深泽县的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拨发一笔经费去抓叛徒。有个中白庄大队，"深挖"中打死了三人。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少数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罗罗王国"，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一切财产，仅留一点土地和牲口维持生计。十二年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成人。而那个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六人，被迫自杀十人。"

"内人党"案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

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一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个才二十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还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八十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

整个内蒙因"内人党"案被刑讯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这是汉人政府对蒙古人民犯的一大罪行。蒙古人民从没见过如此残暴的政权，"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纷纷到内蒙古军区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他写信，报告内蒙揪"内人党"的情况，他才采取措施停止了这个运动。毛泽东说："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一般每个县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阶"并不仅仅宣布某人是某"分子"，开个批判会，喊喊口号斗争就完了。在"清理"过程中，人类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几乎都同时在全国各地施行。结果大批无辜者死于酷刑或自杀身亡。

全国两千余县，一般死于"清阶"的都在一百人以上。

辽宁台安县成立了革委会，把持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的，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都是原来共产党的干部。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便是巩固手中的权。所以只热衷于两件事：在全县范围大发"红宝书"和"按全国统一部署……搞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

钩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打死一百多人是中等，打死一百多人的是多数。如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 925 名，"致死 143 人，占被揪斗人员的 15.45%。致残 32 人。"(k2)上海青浦县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一年，总共死亡二十人，伤一百左右。可是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四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象"就达一百七十人。

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一百〇七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广西南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一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

人口较少的小县"清阶"中死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仅数万，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点二五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杀。

若以区和乡(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挖出"十三个"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k7)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阶"时"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三十多人死于"清阶"。

若再将单位缩小至一个村(生产大队)，也有数字记录在案：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一百一十户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自杀者多于被打死的

一般说来，自杀数远大于被打死的。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阶"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

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七十三人。"(p2)上海宝山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于自杀的为二百二十人。此外还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应当也都自杀身亡了。

非正常死亡二百以上的县也不少

这场运动，有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g7)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达四百人以上的才算是多的。譬如上海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四百五十六人。"

吉林省榆树县，"仅一九六八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一千八百多人。"

又一个"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中共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

十年后"清阶"，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说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阶"，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不过，他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地方搞得更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群众起来了"，是毛泽东的护身符。一九五〇年中共搞土地改革，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泽东反映"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实际上，那"乱打乱杀"正是毛泽东指挥中共各级组织杀戮人民的罪行，与"群众"无涉。

一九六八年、六九两年间的"清理阶级队伍"，也是大规模迫害人民的罪行，其罪魁正是毛泽东。

第六章 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得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〇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1)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2)

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3)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大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德碑的场面。后来北京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党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风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多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风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风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逼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一九六〇至六二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后，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以此为依据收紧政治套索。他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全国近万人因此被牵连受害，挨打、关押、逼死，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两个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杀。

以“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后来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4)

毛泽东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是蛮横的文化独裁的代名词。一九六一年，青年画家徐启雄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娘》曾引起轰动，各报刊竞相转载。一九**年春，徐却受到批判：“画那么多美女，意欲何为？难

道不是想腐蚀革命者的斗志？用这种软绵绵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5)《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受到几位日本文学评论家的赞扬，一九**年被定为“坏小说”。(6)《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被定为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7)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坏戏”、“坏作品”。正在写《正红旗下》的老舍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的心凉了。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8)

老舍的悲剧更在于他没有决心象沈从文那样封笔，干脆什么都不写。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联主席，他的笔还得为党服务。他想跟党走。但越想跟党走，创作生命力越衰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这些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产党治下的十六年间，老舍的文艺生命日趋萎缩。刚回国不久，老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没有给老舍“新的文艺生命”，连他文艺生命的根都刨了。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经枯萎、死去。

◇ 风暴前夕的绝望

人们读了老舍的那种跟浪潮的顺口溜，只痛其自贱，却不了解老舍本人的伤心之处。平素为人不张扬的老舍只是将内心的悲哀深藏着，从不示人。直到文革爆发前夕才头一次将心中的绝望在友人面前倾诉出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间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毛泽东赶走的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才子。人称“副书记”的彭真惜才，将他收罗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说邓拓“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9)四月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老舍心中必定十分悲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邓拓说话，他只能沉默。这时，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形势险恶，赶紧表示对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10)毛泽东厚颜，竟亲自批示将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11)

大约就在这时，老舍自己也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员兼作家王莹的一个电话。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国，他们是好友。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五五年底回到中国。一年多后遇上

反右运动，谢和赓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

这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第二天，老舍就专程到香山看望王、谢。在谈话中，老舍感慨地对王莹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12)

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四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她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 迈出最后的一步

五月底邓拓服药自杀。此时老舍虽然对于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大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13)

但是，这一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去。老舍在“横扫”之列，人们并不奇怪。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自沉太平湖。自一九二七年昆明湖水吞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来，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多年来练了不少旧戏，所以现在觉得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决定在文庙焚烧戏装，顺便将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装上车。

上车的牛鬼蛇神当中，本没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医院抢救，刚刚出院，这一天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他见作家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一眼认出他来，立即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于是老舍也成了他们的俘虏。

到了文庙，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学生，主要是座落在绒线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学生，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除老舍外，这些跪成一圈的“黑帮”中还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领导干部田兰、江枫，右派分子萧军，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白云生等。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¹⁴⁾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¹⁵⁾

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

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就在孔庙挨打的前的一个星期天，老舍曾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还将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里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告诉了舒乙。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最便捷的结束耻辱的办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注 释

- (1)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 (2)《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165页。
- (3)老舍夫人胡洁青“《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69页。
- (4)《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358页。
- (5)《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一七七页。
- (6)《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第113页。
- (7)《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第99页。
- (8)《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第250页。
- (9)《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59页。
- (10)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 (11)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二八页。

(12)《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39期第40页，王文革中死于监狱，谢和赓的回忆。

(13)巴金《随想录》第二集第十六页。

(14)《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三卷第148页。

(15)同上，第149页。

----- 第七章 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或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 周毛联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窥而见：“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丁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1]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现后上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总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湖南对“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2]

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将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言论”的组织和个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七〇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

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3]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需报请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4]文件是这么说的：“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5]这样，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市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大规模地镇压言论、思想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〇年完成的。

◇ “一打”与“三反”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6]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7]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那个“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算不上“投机倒把”。而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可是上面说要搞，下面就捕风捉影，胡斗乱揪。譬如陕西勉县“三反”搞出了“贪污”现金十六万元、粮票五万斤、布票一点六万米，投机倒把牟利一点四万元的“分子”。文革后复查，全是冤案。[8]

就全国来说，“三反”未成一个运动，所以“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但人们现在还在说“一打三反运动”，本文亦采用“一打三反运动”的说法，恰如一说到一九六〇年人们就说“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其实只有“三年困难时期”，并无“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那么说，说顺口了而已。“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〇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的《通知》。该通知（见所附影印照片）首页的上部是两则“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话，时称“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大字黑体以显示其庄重严肃：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下半页才是《通知》的内容：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北京市参加讨论的“革命群众”都相信顾文选“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绝不会想到其“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的冤案。

一九五七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他奉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 [9]

这样，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觉得在北京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当局说是让他们留场“就业”，目的却是永不让这些人回到社会做个正常人。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诉黄他准备逃跑，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10] 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是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布的《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除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这些反革命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他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

在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指“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自然应予处决。但他的父亲张仉是中共老干部，张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总理周恩来与张仉熟识，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替张郎郎保了一条命。

◇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要“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某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于通知上的“最高指示”已经说明要“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已经指明该五十五人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狠狠打击。要“革命群众”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要他们表态反革命该不该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是不行的，弄不好“革命群众”也可以转化成“反革命”，谁都不敢说“不该枪毙”。所以在那种场合下，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异口同声：“枪毙，枪毙。”

中央美术学院讨论张郎郎该不该枪毙的会上，画家黄永玉、刘迅不敢反对，又不愿表态同意，只好托词逃会场。有人曾回忆这种“革命群众”的讨论会：“当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破坏’甚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甚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说‘枪毙，枪毙’，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

◇ “借斗”现行反革命以“教育群众”

北京市那批“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的一个多月里，被分成小组，天天拖着脚镣和手铐，分别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要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需借用这批活靶子，连“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们的“借去”斗争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报废扔掉的东西，还需要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

一九六九年七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随后三个月内，《人民日报》每隔半个月便发一整版的批判文章。上海煤气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桑伟川写了篇批驳文章，为周而复的这部小说辩护，结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此后，全市各单位都向煤气公司“借斗”桑伟川，以教育本单位的群众。桑伟川前后被各单位游斗了二百九十多次，方押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11]

贵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张贴了一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兰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二月二十五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她被正式“逮捕”。从即日起她就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五月十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这个女子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的最后洗礼，死时年仅三十岁。[12]

◇ “一打三反”在各地

有文化的人是运动重点。譬如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

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 173 人，处分 84 人，三人自缢身亡。[13]

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中共中央委员徐景贤亲自拼凑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不惜工本印了二十万册。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14]

“一打三反”规模极大。譬如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662 起，“定案”处理 483 人。[15]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 2392 人。河北邢台县“挖出”122 名反革命分子。[16]

全国在“一打三反”种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万人。

◇ 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

三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现行*****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刑事判决书：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省昌邑县人……[17]

十三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十三名“同案犯”则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二十六人多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他们在劳改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他们的人生经历难以一一追踪，人们仅对任大熊、刘世广二人的身世略知一二：

任大熊：一九五七年时为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结果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化革命开始后，一九七〇年三月，山西大同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破获一个名叫“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现行*****集团”，一举枪决十三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一。

刘世广：五七年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后，于一九五八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合并的策划人之一。当然也够格做“主犯”了。（一九五七年整风时用笔名马崎张贴大字报《还政于民》的马维崎，以及写《神？鬼？人》讽刺个人崇拜的孙宝琮，可能均罹难于“一打三反”。）

◇ 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一九七〇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除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算是“恶毒攻击”外，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的论文文章。其中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〇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确是一篇讨伐当局法西斯**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 and 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因一名女生熊曼宜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18]

◇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〇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青年农民谢永祺一九六〇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莆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19]

◇ 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

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文革一开始即被送四川芦山县的劳改农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狱。一九七〇年一月胡风因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〇年六月枪毙了他。[20]

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紮“忠”字牌楼，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21]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这算犯了“恶毒攻击”罪。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32108钻井队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自办油印的《中国工人报》，评说国家大事，于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到大会斗争。大约因为其父是位高级干部，被轻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来自四川出身平民的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滩枪决，

无人敢为他收屍，遗体喂了野狼。

七〇年八月被枪决在宁夏银川的二十二岁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一九七〇年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22]

二、“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全国各地都有因不赞成打倒刘少奇而获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仅浙江省淳安县就有二十八人“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判刑”。[23]被枪决的到处都有。

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于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死在枪口下。

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二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湖南：因“现行反革命”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报》编辑钟叔河回忆：“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24]

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己见，认为“刘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检查，他就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吹捧刘少奇”要付出代价，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尸体无人收埋。

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结果于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针对中共中央文件对刘少奇“叛变投敌”的指控，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25]为此，张志新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即便在那样的高压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多达两万八千多人。（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处死的，约三万人。”[26]）

文革后最高法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万四百〇二人中，许多是“为刘少奇同志冤案鸣不平而被冤杀、错杀的”。[27]

三、“攻击江青同志”：

许多人因议论江青而惨遭杀身之祸。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因“攻击”罪被定为“反革命”判处五年徒刑。上海一位舞蹈教员，听了别人议论江青的言论而没有揭发，也被逮捕下狱。[28]

上海一个作曲家欲歌颂江青，采用越剧的曲调谱了一首歌。但是江青不喜欢越剧，曾说过越剧是“靡靡之音”，因此该作曲家马屁没拍成，反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29]

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学生会主席傅小石（名国画家傅抱石之子），在该校曾被许多人包括院长江丰在内，都认为是个“天才”。江丰被定为右派后，他因对院长表示了一点同情，也被打成右派。先在劳改农场呆了四年，在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父亲给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写信求助后，被放回江苏省国画院当一名勤杂工。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审”，判决书说他攻击江青、反对文革，“罪大恶极，但因能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判刑十年。” [30]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31]

四、“攻击”省市首长：

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任四十里店公社书记的原西北局干部田涛，因揭发批判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并于二月十二日在银川市街头张贴大字报批评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当即被捕。三月十五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次年死于狱中。

五、要求宗教活动：

在文革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严厉打击制裁回族的宗教活动，“把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当作‘四旧’予以破除，还采取下指标、定任务的办法，强迫回族聚居社队和回民家庭养猪，并把这……当作‘新生事物’宣传推广。同时，宗教机构被砸烂，宗教团体被解散，广大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予以禁止。”这种对宗教活动的打击，仅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一时有效，以后被禁而不止，从未能杜绝回民的宗教活动。一九六九年前后，海原县回民的宗教活动被当地政府无端限制，老百姓对此不满而斥责政府，结果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而追究，牵连两千余人，四十八人被逮捕判刑。 [32]

六、莫须有的“反革命”罪：

一位退休了的知识份子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蓝，星星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如今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月亮没有封建主义月亮好”，于是也成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被罚扫街，一直扫到几年后文化革命结束，街道为他“平反”为止。

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片，汇成了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的教师和学生翻阅。如今那本资料成了反革命罪证。七〇年九月，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在宣判大会上，判了二十年徒刑。该校两位写抗议书为莫定钦鸣不平的教师也被判处“劳动管制”两年。 [33]

◇ 制造各类“反革命集团”案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了一人，打残二人，将二人逼得自缢身亡。受株连者多达一百一十五人。 [34]

七〇年三月，山东安丘县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杀人案”，“凭所谓检举材料，对县运输公司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关押，造成自杀未遂五人，含冤身亡三人，致残一人。” [35]

◇ 越到上级越“左”越疯狂

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她发了些议论，如“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等等。她本被判处五年徒刑，可是七〇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于是九天之后，她就倒在了城外的一块麦田里。[36]

四川，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方运孚经常与人谈论自己的观点：“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后，公安局为表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起初经办者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最后，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改成了死刑。连原先经办此案的人都不明所以：“这样的案件为什么判处死刑啊！”本来犯人可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七〇年三月。[37]

◇ 疯狂的杀戮

一九七〇年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学生张九龙。据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38]

七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兰州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赴刑场处死。

一九七〇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一一宣判后，二十四名犯人被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卡车一路行进时，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事前，革委会当局已经严密组织沿途各街道委员会，划分了各自组织群众观看游街的地段。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需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的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39]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紮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刑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

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〇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40]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着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41]

◇ 各地“支左”部队的首长与军管会负责人主持杀人

主持杀人的几乎都是中共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多半是在文革的血泊中升的官，对于人命何价毫无概念。一九七〇年十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42]

原来在军队担任军政委、军长的康建民、在宁夏自治区领导人被打倒后调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他公开发指：“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毙掉十个八个的。”[43]

“不服管教”的反革命中，有一位名叫朱守中的。他原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因反右运动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中卫县中学任教。一九六一年曾被押去劳改。**年四清运动，他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管教”，常有反革命言论：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像这种做法，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其言论报到康建民那里，便在“一打三反”中被“毙掉”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冼恒汉主持的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就决定判处甘肃师范大学教授张师亮死刑了。七〇年月三月十七日，冼恒汉又主持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复议维持原判。军区党委决定后，甘肃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只不过复议通过，盖了个橡皮图章。[44]

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于七〇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点名单。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就揪一个，马上按成“喷气式”。随后便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造成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45]徐海涛有功于张春桥，所以张春桥当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他，给了他一个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二十七人，另致使二十人自杀身亡。[46]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判处死刑。市革委会主任是“支左”的部队首长。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 [47] 祇因为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查，确证是一起冤案，那几名受迫害的人的头才没有被削掉。

◇ 杀人也有“指标”

陕西铜川煤矿有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党治国。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学生。即便是在劳改，他也不忘宣传马列主义。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煤矿工人业余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样便算犯了“现行反革命”罪。

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覆处决。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已作好计划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十多年后，他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书。而那四位排名在他前面的“现行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48]。

应当指出，在那乱捕乱杀的当头，也有正直的司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安徽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了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都判了有期徒刑。安徽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的“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案者为了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邀功，通过刑讯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 [49]

◇ 大批国人自杀

又有大批中国人被逼得走上了自杀之路。

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的“一打三反”，“有二百五十多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50]

江苏溧水县，一九七〇年初开始“一打三反”，死亡十三人。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二三八起，其中死亡一八八八。”“河池地区自杀一六九人。” [51]

由于“一打三反”紧接着“清理阶级队伍”，所以许多地方谈到非正常死亡时，将“清阶”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〇七人非正常死亡。”河南安阳市郊区笼统记载“清队”和“一打三反”共死亡二十八人。 [52]

◇ 全国逮捕二十八万多“反革命分子”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〇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53] 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 [54]

一九七〇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55]

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注释：

- 1 《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 695 页；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 2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 100 页。
-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77 页。
-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337 页。
- 5 同上。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80 页。
- 7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 330 页。
- 8 《勉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 461 页。
- 9 《右派论点选辑》（北京：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1957）第 32 页。
- 10 黄继忠与本书作者的谈话。十多年后黄继忠获平反，回北京大学时才听说顾文选被枪毙之事。
- 11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周而复发言第 1 至 10 页。
- 12 老鬼《死刑犯有说话权》，《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号。
- 13 《西平县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 308 页；《沂水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 35 页。
- 14 《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第 239 页；《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第 328 页。
- 15 《泰兴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 31 页；《户县志》（一九八七年版）。
- 16 《安阳市郊区志》（1990）第 40 页；《邢台县志》第 36 页。
- 17 《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第 63 页。
- 18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第 63 至 71 页。
- 19 戴煌《直面人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三一五页。
- 20 《安康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九〇八页。21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 138 至 145 页。
- 22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 172 页。
- 23 《淳安县志》一九九〇年版第 531 页。
- 24 《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 156 页。
- 25 《共产党员》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张志新《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
- 26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史出版社，1996）第 196 页；《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 2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九页。
- 28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吴晓邦发言第 11 页。
- 29 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 30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二〇〇〇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 31 《春风化雨集（上）》第四〇六页。
- 32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 166 页。
- 33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 52 页。
- 34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 167 页。
- 35 《安丘县志》（1992）大事记。
- 36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二〇五页。
- 37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 107、113 至 118 页。
- 38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 148、295 页。
- 39 《炎黄子孙》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第 43 页。
- 40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郑兢业《忠烈失骨骸，张志新魂归何处？》，2002.12.18《亚洲周刊》

- 41 《十月》一九八〇年第二期第 152 页。
- 42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一九七页。
- 43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四一七页。
- 44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 90 页。
- 45 叶永烈《张春桥浮沉史》第十二至十四页。
- 46 《安康县志》（1989）第 908、909 页。
- 47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 117—118 页。
- 48 《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七月号，陈祖芬《理论狂人》。
- 49 朱孝池等《法官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一九七页至二〇六页。
- 50 《贵德县志》（1995）第 29 页；《南汇县志》（1992）第 138 页；《宝山县志》（1992）第 47 页。
- 51 《溧水县志》（1990）第 32 页；《当代中国的广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 132 页。
- 52 《镇雄县志》（1987）第 325 页；《安阳市郊区志》（1990）第 40 页。
- 5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337 页。
- 54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 330 页。
-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第 649 至 650 页。

第八章 文革死亡人数统计为两百万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 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笔者相信应在二百万以上。

◇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皮带。杀与己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

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而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被打死的各类“份子”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是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参战的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 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一百九十一人。

有的地方群团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残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各级革命委员会平易近人这场运动的执行者。比如辽宁台安县城各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钩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 五十万人死于清队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计逼供，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如黑龙江省大庆油田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在“清队”运动中，“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军宣队领导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审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一场大血案。“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份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敌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云南又有“划线”一说。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便入了另册。“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长王志刚，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夥人”。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因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合夥“专了我们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窝”，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据方纪说，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来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并由业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控制。不久，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日后无法控制，一九四六年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结果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胡抓乱捕，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份子。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一说“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存疑。）

◇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〇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行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〇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〇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〇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切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着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尾声

千万冤魂—中国大陆五十年非正常死亡调查

回顾中国五十年走过的道路，在人们记忆深处，有一份非正常死亡者的名单。据来自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这是记载着至少三千二百万无辜者姓名的长长的一份死亡名单。记者就这个题目，采访了对中国当代史一些重大事件作过艰辛调查、专门研究的几位专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现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阮铭先生认为，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生前对老百姓戕害最深的时期。

阮铭：毛泽东生平对老百姓戕害最大的，一个是三年大饥荒，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上是不可以

原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牺牲了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实际上牺牲的更多的是老百姓，特别是六八年的武斗，牺牲了多少老百姓！大饥荒主要是饿死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间最根本的祸事就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到现在，有关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中共也没有公布，目前估计有两三千万人，当然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

记者：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一书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担任教授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丁抒博士对于这一问题有专门的研究。丁教授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 “死亡不要再统计下去了”

丁抒：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这个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本地区饿死人的情况，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了上面的表扬，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

当时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贾启允曾这样说：“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由此可见，全国各地真实的死亡人数是很难准确计算的。

记者：丁抒教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份的情况？

丁抒：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一九六零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个县一九六一年的人口统计，共减少了四十多万人。”

一九九零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人民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时候，曾经对无为县最早实行供给制大加夸奖，可是就在一年以后，无为县竟成了人间地狱，该县饿死了约二十万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一九六零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北京大学现在一位教授当时在全椒中学读书，一九九五年他对友人回忆道：“我一九六零年上初中时，是在县城上学，每月有三十斤口粮，而我的养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都饿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个大村子，村里至少饿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龄伙伴，没在县城上学的，差不多都不在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凡是在县城里上中学的，都有定量的口粮，所以饿不死，而没有上学在村里的，差不多都饿死了。这位教授还说：“我上中学的时候，路边全是死人，有的还有气，没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一九八六年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实际上，甘肃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万，接近二百万。

当时，河南有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各县分别披露的数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六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接近了五十万人，而在信阳地区，这样的县、市还有九个。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了信阳，调查了五个月以后，

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山东的情形与河南差不多，饿死人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因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得到了领导权而闻名。但是，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遵义县仅仅在一九六零年内就死了七万一千八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一听说，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结果，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曾经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七月三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坟头多，纸钱多，白鞋多

天府之国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曾经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毛泽东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设施，灌县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就在这个从来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有四万人饿死，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曾经视察过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家。”这是当时郫县乃至全四川的学童都得会背诵的歌谣。可是两年以后，就是这个红光社，人口竟减少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占该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过《毛主席到了我们家》的学童，成了毛泽东人祸的牺牲品，活活被饿死！

一九五九年曾经宣布粮食要平均亩产万斤的富顺县，饿死十万余人，每七个人中就死了一个。长江三峡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每六个半人中就饿死一个人。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中就死了一个。四川荣县六十多万人口，有四分之一饿死在那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全国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省份，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一十多万，每九个人中就死了一个。

鱼米之乡一样饿死人。一九五八年曾经放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全国头号高产卫星的环江县，一九六零年饿死了三万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居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开卖人肉！从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在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一个很富庶的高淳县，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自赴高淳进行调查，回到南京以后，他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只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老家在长江北边的江都县，就在这个富庶的水乡，三年间饿死了三万八千四百人。江苏北面的高邮县，饿死了三万七千多人，其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全国到处都饿死了人，哪个省都不例外。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当时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在虎林县兴华村劳动，据他回忆，一九六零年秋收前后，村中就开始死人：“有一个同我一起驾牛车拉草回来的老汉，第二天没有起来，躺在炕上走了。一个同我很谈得来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想喝一碗稠稀饭。’一九六一年年初，我离开兴华村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区农民是被牺牲的一群。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向东，出了城就是通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拓事后这样承认说：“当时，通县的大镇永乐店有“三多”：坟头多，坟上的白纸钱多，穿白鞋的多。”

记者：丁抒教授，据您所知，历年来学者们公布的中国全国大饥荒死亡的数字是多少？

丁抒：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书上说，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一篇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公布了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

“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人”。一九九六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三千万人饥饿致死”。

一九九一年，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千四百七十万。最近，我又根据中国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重新作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三年大饥荒中至少饿死了三千万人。

◎历史、世界上空前的自杀高峰

记者：除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以外，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集中的又一个高峰。根据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的研究，一九六六年在以红卫兵制造的以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里，仅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人超过了一千七百人。王博士您认为，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王友琴：根据当时内部的报告，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有的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要大。打死人的最高峰的时期是在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在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之间。

打死人这样的行为不仅在北京发生，也在外省发生，正是因为这些死者是普通人，是无辜者，所以记住他们的名字，表示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每一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

巴金先生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可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博物馆有实际动工的可能。尽管如此，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白纸黑字地把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写下来。

记者：丁抒博士，您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大量打死人的情况是怎样看的？丁抒：文革中死人，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从六月份到八月份那一段，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黑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带。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的，应该不下十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那么大的范围内，用那么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八月二十四日，作家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杀，接着，许多人选择在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太平湖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估计文革初期全国自杀的人数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有的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引起当地军队的镇压，造成大批伤亡。武斗需要武器，很多地方是在军队支持下明抢暗送，半送半夺，或者干脆就开放兵器库任意拿龘这一切，毛泽东是知道的，所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时候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在旁边解释：“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的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虐杀的战俘。比如，河北雄县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妇孺用铁丝串起来，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乱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包括用长矛杀戮，用刀砍，用石头砸，用枪打，以致绞死；

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安康县甚至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十三个人。武斗使人变野蛮，视人命如草芥。四川内江市竟然有人因为与人交换毛主席像章而发生争执，打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二人，炸伤四十九人。

两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该在三十万以上。“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平均有一百多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几个大案子，每个案子都死了相当多的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被揪斗，被关押，其中四分之三是蒙古族人。因为刑讯*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江西万年县委群众专政指挥部所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铜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袄、在太阳下曝晒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蔑为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用电击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整死的人数多于武斗和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粗略估计，死于清队运动的人数应当在五十万以上。

记者：紧接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是“一打三反”运动，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丁老师请您谈一下“一打三反”中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割喉管

丁抒：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另一个文革期间死人的高潮，是当局所谓“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十年间官方杀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零年代“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七十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零年判处的就有二十二人。

枪决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反革命分子发不出声音的作法在全国大行其道。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为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枪毙，在押往刑场前，他的喉管被割断。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之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音来。当局在枪毙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前，也割断了她的喉管。

据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画家韩美林回忆他当时在安徽淮南市，监狱中一杀人，就清晨四点钟拉铃，然后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播放样板戏，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他们用手一个一个地点：“你!”，“你!”，“你!”，而后是惊天动地的哭叫，随着是一阵慑人魂魄的枪声。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仅是文革中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概而论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二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

记者：丁抒博士以上谈到的仅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集中的几个时期的情况，五十年来，各个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虽然背景不同，但都不会被历史遗忘，其中相当多的人在他们含冤离开这个

世界的时候，甚至被剥夺了受到人们公开哀悼的权利。